

从一大到十六大

◎李颖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从一大到十六大

下 册

李颖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一大到十六大(上、下册)/李颖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ISBN 7-5073-1115-5

I. 从… II. 李… III.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史料 IV.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02)第089551号

从一大到十六大(上、下册)

编 者/李 颖

责任编辑/张文和 于丽娟

封面设计/张 戈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010)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安泰印刷厂

850×1168mm 32开 33印张 800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套

ISBN 7-5073-1115-5/K·535 定价:60.00元(上、下册)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国共产党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是党的八大的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筹备工作“好事多磨”，政治报告修改稿达80个；邓小平担纲修改党章；周恩来起草“二五”计划报告；毛泽东起草了两个开幕词讲话稿，不知为什么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于是又叫田家英再起草一个。可见党的领导人对八大的重视。八大正确地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八大前的筹备和召开

在解决高饶事件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自从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十年过去了。十年内，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纲领，是中共中央面临的重要任务。在1952年年底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后，中共中央曾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党的八大，并已着手进行准备。但是，由于发生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着重处理这个问题，召开八大的事就拖延了下来。到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同时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和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

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是：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大会工作报告的起草，邓小平负责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周恩来负责“二五”计划指示的起草。邓小平在全会上对召开八大的决议草案所作说明中宣布，这次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书记处将开始上述四项议程的准备。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的主要精力转向主持八大工作报告（后来改为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八大准备期间，国内形势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席卷全国之势猛烈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大大加快了步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100多人参加的中央座谈会。会上，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并对八大准备工作做出部署。他说：

“在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

主席说过，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客观要求我们加快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需要，是稳步前进。

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线前进，几条路线比
较一下，要选择一条比较合理的、正确的路线。上、中、

下三策，哪个合理，哪个正确，就选哪一个。

要站在群众前头，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鼓励群
众，不要泼冷水。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成绩，这就
是现在中央所实行的路线，这就是稳步前进。另一条

是按常规走路，照老样子前进，时间拉得很长，群众
没有气，成绩不大，这是保守主义路线。我们有不少
同志却正在走着这条路。
计委做平衡工作，希望平衡一次，安定一个时期。

主席说，客观事物，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
不断平衡，不断冲破，这是我们前进的规律。冲破了
平衡是好事，不要怕。（周恩来：湖塘的死水是臭的，
活水才不臭）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就恰恰要
犯错误。

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可能
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特别是重工
业千万不可骄傲，因为我们既无经验又未搞好，工业
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人说：“可不可以让农业等一下
工业，不要走得那么快？”这种说法是右的。不能叫农
民等，而是工业要赶上去。农村合作化了就更有利于
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准备明年9月召开八大，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希望
各部门立即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发现新的工作方法，
改进工作，反对保守主义，加强全面工作规划，迎接
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的

工作结合起来。”刘少奇在向全国的干部阐述中共八大精神时，对“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倡团结、民主、活泼、生动活泼的作风”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在讲话结束时提出：“八大精神要贯彻到各条战线上去，八大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准备找各部同志个别谈谈，请你们准备。有材料请你们送来。”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是在较大范围内第一次明确传达中共中央在八大准备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它表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党中央思考八大路线基本思路时，已经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今后奋斗的主要纲领和主要任务。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事。但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还了解得很少，对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十分不足。刘少奇在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说法，反映出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

“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最初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提出来的。它在一段时间内对党的各项工作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1年12月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以来，一直发展得较快，到1954年底形成了一个高潮。这年年底，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并计划到明年发展到60万至70万个。在一大批新建的合作社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盲目求快。为了使合作化运动能够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

子恢在1955年初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建议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邓子恢的建议，最初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1月10日，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签署发出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4月上旬，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同各省负责人谈话时，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各省都有了很大发展。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巩固和办好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一批。这一批办好了，就给农民树立了旗帜，训练了干部，积累了经验，就为今后更快地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今天大部分农民对农业社还有怀疑、干部还没有培养出来和办社经验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再像去年那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是冒险的。”

4月20日，刘少奇在他主持的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说：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乡、区未办的，有条件的可以试办。全国合作社已经发展到67万个，其中发展过多的省份超过两三万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能巩固住五十几万个社，即是最大胜利。这次会议以后，一些农业合作社上得较快、问题较多的省份，如浙江、山东、河北等省，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帮助下，压缩了部分办得不好的合作社，其中浙江压缩得最多，约15000个，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67万个减至65万个。

6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子恢关于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邓子恢在会上建议，在1956

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从现在的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会议批准了这个建议。刘少奇在讨论时说：明春发展到100万个，然后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对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毛泽东最初是相信的；对中央制定的停止发展、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方针，毛泽东也是同意的。但是到1955年夏季，毛泽东的想法起了变化。他在到外地进行调查后认为，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党内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农村工作部的部分同志，存在一种消极情绪。在5月中旬一次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警告：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对邓子恢提出批评，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在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10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更为严厉的措辞，批评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是“小脚女人走路”，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在党内造成一种紧张气氛：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就大大改变了农业合作化的原定进程，使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下半年急速发展，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对毛泽东的决断，刘少奇一直是很信服的。这年10月11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表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作检查说：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

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到1955年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4.9%；到1956年上半年，达到90%多。

毛泽东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思想同样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表露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要加快的设想。10月下旬，毛泽东接连两次找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以后，到杭州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1月16日至24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部署了今后的工作。1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说：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大体上有这么几种办法：一种是没收，一种是挤垮，一种是赎买。在我国，用赎买的办法，统一战线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他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即采用赎买的办法废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和实行和平改造的国际国内条件，要求全党在目前这个紧要时期要统一思想，积极领导，争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

这次会议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大大加快了。刘少奇在16日的讲话中提出的时间表还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

基本上完成”，可是在实际进程中，到1956年上半年，仅仅半年时间里，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

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大地上建立起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此后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要求过急过快、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留下不少问题。这种急躁情绪，同样也带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正确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是一项正在继续探索的异常艰巨的任务。

按照在中央座谈会所说“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设想，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开始分别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了解经济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为起草八大报告做准备。

这是一次系统的调查。据“刘少奇工作日志”记载，从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三十七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大致如下：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
城建总局局长万里；
十二月八日、十日——一机部部长黄敬；

- 二机部部长赵尔陆；
三机部部长张霖之；
- 十二月九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廖鲁言、
刘瑞龙、魏震五；
- 十二月十二日——煤炭工业部部长陈郁；
- 十二月十三日——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
- 十二月十四日——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
景范、宋应；
- 十二月十五日——建筑工业部部长刘秀峰，副部
长周荣鑫；
- 十二月十六日——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
吕东；
- 十二月二十二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
- 十二月二十七日——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
- 十二月二十八日——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
张琴秋；
- 十二月二十九日——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
- 十二月三十日——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副
局长邓洁；
- 十二月三十一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副部长
金明；
-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月——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
陈希云、喻杰；
- 一月三日——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王磊；
- 一月四日——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供销合作总
社副主任张启龙、邓辰西、邓飞；

一月五日——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副局长解学恭；

一月六日——农产品采购部部长杨一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副局长陈希愈；

一月七日——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副局长刘子久、毛齐华；

一月八日——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

二月十六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局长刘建章、余光生；

二月十七日——交通部副部长李运昌、朱理治、马辉之；

二月十八日——邮电部副部长范式人、钟夫翔；

二月二十一日——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李平、沈图；

三月五日——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局长刘恺风、刘子载；

三月六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柳湜；

三月七日——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傅连暲、崔义田；

三月八日——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

三月九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

5月28日，刘少奇又分别听取新华通讯社负责人吴冷西、朱穆之、缪海稜、邓岗、石少华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梅益等的汇报。

为了开好这些汇报会，刘少奇在这几个月内，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和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座谈会常常从白天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在座谈中，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刘少奇关注的重点。他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设备状况、产品流通以及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当前工作和今后目标提出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

——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因为沿海地区现有企业需要的投资少，能力大，见效快，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今后投资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重点建设，一个利润大、见效快的事业；

——应当重视利用中国手工业发达的特点发展中国的工业，把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结合起来，接受手工业的优良传统技术，同时帮助手工业机器化，提高生产率；

——要想办法把产品质量标准定下来，多搜集技术资料，为了研究新产品，要把资本家中会搞设计的人养起来；

——工业生产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生产，商品供应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供应，不断增加品种花色，满足人民的需要，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来促进生产；

——企业内部要高度重视经营管理工作，加强科

始进行研究，学习和尽量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研制新产品，生产新品种；革新的人才，是完成技术革新的一条重要途径。调查组建议要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允许企业间地区间开展的竞争，造成落后就不能生存的气氛，技术太落后的企业要加以淘汰；在私营商业中要实行公开竞赛的办法。

刘少奇要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采用多种办法培养和选拔懂技术的干部，同时要注意发挥资本家的一技之长，虚心向资本家学技术，学管理，学外国经验；反对官僚主义，出卖工人群众的金钱利益，中饱私囊；企业中的工人不能全招正式工，要采用合同工或半工半读制；企业要建立个十项规章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存在着不灵活性、愚蠢性，不能适应地方情况的变化，做生意的人要很灵活，很关心敏感；中央号召人民普遍学习单干户，家庭户，革命委员会，小商贩可以组织起来，但不要完全并掉，保留；剩下10%也不要紧，不要改变他们的经营方法；非公经济在学习国外经验时，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

由于刘少奇这些意见是在汇报会上用插话的形式提出的，事后也没有经过归纳和整理，不很系统，但对启发大家的思路，指导当时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这次调查，使刘少奇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状况，对各部门各行业存在的问题，心中大致有了数，这就使起草八大报告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得知刘少奇正在系统地听

取各部门的汇报，十分称赞这种方法，表示也要用这种方法做一番调查研究，要薄一波帮他组织。于是，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底，毛泽东又先后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刘少奇也多次参加了毛泽东所组织的汇报会。

汇报会结束后，毛泽东集中这次调查研究中的成果，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

在4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两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历史任务，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主要问题，即十大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大事，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毛泽东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这样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自己的适合中国的路线。”

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指出：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他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